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勇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学术著作

抗战大后方 教育研究

主 编 ● 徐 辉
副主编 ● 冉 春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学术著作

抗战大后方 教育研究

主 编 ● 徐 辉
副主编 ● 冉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大后方教育研究 / 徐辉主编.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229-10024-7

I. ①抗… II. ①徐… ②冉… III. ①教育史—研究—中国—1937~1945 IV. ①G5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4154 号

抗战大后方教育研究

KANGZHAN DAHOUFANG JIAOYU YANJIU

徐 辉 主 编 冉 春 副 主 编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苏晓岚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 吴庆渝 陈 永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4.50 字数: 370 千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10024-7

定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编纂委员会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 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山田辰雄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马振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王川平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王建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方德万 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巴斯蒂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西村成雄 日本放送大学教授

朱汉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任 竞 重庆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任贵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主编

齐世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庭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汤重南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步 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何 理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国防大学教授

麦金农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 玛玛耶娃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教授
- 陆大钺 重庆市档案馆原馆长、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
- 李红岩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历史研究》副主编
- 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资料》主编
- 杨天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杨天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杨瑞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 吴景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汪朝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张国祚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原主任、教授
-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张海鹏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陈廷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陈兴芜 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编审
- 陈谦平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陈鹏仁 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 邵铭煌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 罗小卫 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编审
- 周永林 重庆市政协原副秘书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 荣维木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徐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徐秀丽 《近代史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郭德宏 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傅高义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温贤美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谢本书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简笙簧 台湾国史馆纂修
廖心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熊宗仁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
潘 洵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魏宏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高建 刘志平 吴 晨 别必亮 何 林 黄晓冬 曾海龙 曾维伦

总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的战端,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使日本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

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导 论

一、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是 20 世纪上半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世界近代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具有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的重大意义。抗战问题研究既是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抗战大后方研究是抗战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抗战时期的教育研究,特别是抗战大后方教育研究,学术界还研究不够。较早期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多从笼统的角度着眼分析,如郑世兴著《中国现代教育史》(台北三民书局 1981 年版)、熊明安主编《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李桂林著《中国现代教育史》(吉林出版社 1991 年版)、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等,都只列有一章或一节讨论战时教育问题。近年来,抗战教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但关注重心多集中于正规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涉及战时大后方基础教育、社会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问题者不仅数量较少,且多限于宏观层面。对此,余子侠、冉春著《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抗战时期国立中学的创办及其意义》(《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抗战时期西部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及其历史反思》(《民族教育研究》2005年第4期)、《抗战时期中学西迁及西部教育的发展》[《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5年第4期]及马廷中《民国时期云南教育史》(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莫子刚《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发展民族教育之历史考察》(《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陈理《抗战时期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刘亚妮《论国民政府时期甘宁青的边疆教育》[《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3期]、张研《论抗战时期云南的社会教育》[《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莫子刚《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展“民众教育”的政策与措施——以贵州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张学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等研究成果中已有一定程度探讨,但整体挖掘力度仍有不足,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有待进一步拓展。另一方面,在地方教育史研究中,诸如李定开主编的《重庆教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涂文涛主编的《四川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蔡寿福主编的《云南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孔令中主编的《贵州教育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傅九大主编的《甘肃教育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虽对抗战时期大后方局部地区的教育状况有所研究,但大多数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的教育史的梳理,未能从整体角度反映出战时大后方教育的全貌。

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教育通过直接输送人才、提供智力支持、唤起民众抗敌热情等方式,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而抗战这一特殊时期也对大后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西南、西北等地教育的长足进步,改变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整体格局。因此,研究抗战大后方的教育问题,有助于将中国近现代史相关研究推向全面深入,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和重庆地方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对抗战时期的教育研究,特别是抗战大后方教育研究,学术界的已有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欠缺。本研究立足整体,通过专题的形式加以条分缕析的梳理,力求全方位、多层次、客观真实地展现出抗战大后方教育的历史全

貌。针对以往相关研究的种种不足,进行了有侧重的重点和创新研究。研究成果不仅全面地展现了抗战大后方各级各类教育的实施状况,也深入地探析了抗战大后方教育的整体影响和历史地位,可为当今教育的发展提供可贵的经验教训。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对策建议

按《现代汉语词典》界定,“大后方”在现代汉语中系专有名词,特指“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西北地区”。根据抗战时期人们的共识,西南是指当时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康省及重庆特别市;西北指当时的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绥远省。对应到现今的行政区划,本课题研究之“大后方”特指以当时今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广西、宁夏、新疆等10省、直辖市、自治区。

在对“抗战大后方”空间地域加以界定的基础之上,本书将“抗战大后方教育”的时间跨度定位为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至1945年8月抗战结束,即“八年抗战”时期;研究主题包括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教育政策、教育形态、教育思想、教育人物及教育活动。研究框架以专题形式呈现,其整体结构如下:

第一章 指导全国抗战的大后方教育政策。专题探析了抗战大后方教育政策的历史背景、形成过程和具体实施。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保存和延续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培养后续人才,国民政府当局逐步确立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基本方针。在“战时须作平时看”政策方针的指引下,大后方为沦陷区流亡师生提供了较为安定的教育场所,延续了中华民族教育的命脉,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前方抗战和后方建设各项事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大后方教育自身也借助政策优势和资源整合,在抗战期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第二章 保存民族希望的大后方基础教育。专题研究了大后方基础教

育战前的基本概况、战时发展的具体措施及其特点影响。战时通过转轨国民教育制度、提升国民教育质量、救济收容战区学生、组建迁转国立中学、扶助战区中学西迁、督促地方中学发展等措施,大后方基础教育获得了有利的历史机遇,在学校数量、教学质量、课程教材、师资水平、经费来源、管理考核等方面都较战前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极大地改变了战前的薄弱状态。

第三章 服务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职业教育。专题分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职业的政策措施、发展情况和历史评价。战时的大后方职业教育秉承服务抗战的基本方针,加强了教学与生产建设的密切联系,并有效调动国家、地方、民间各方办学的积极性,获得了良好的政策支持和物质保障,构建了比较完整充实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后方职业教育注重结合前方抗战和后方建设的迫切需要,及时调整专科科目和课程教材,健全行政组织和扩充经费设备,提高教学质量和师生待遇,依靠正规职业教育机构、职业补习教育、技工训练等多种方式,为抗战建国培养了大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也有力地促进了大后方的经济和社会建设。

第四章 培养民族精英的大后方高等教育。专题在总结抗战大后方高等教育整体变迁的基础上,论述了战区高校内迁的基本过程,并以国立中央大学、私立复旦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西南联合大学为个案,分别探讨了各类高校在大后方办学的具体情况,最后归纳了大后方高等教育的历史评价。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高校内迁运动的直接影响下,西部地区原本较为薄弱的高等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空前进步,并在经济生产、文化科技等多个方面推动了大后方整体的发展。通过科学研究、思想宣传乃至走上前线参加对敌作战等途径,大后方高校师生也为抗战救国作出了突出的直接贡献。

第五章 动员全民参与的大后方社会教育。专题介绍了抗战大后方社会教育的组织管理和目标任务,详尽说明了大后方社会教育丰富多样的开展形态,并总结了其历史作用和影响。抗战大后方的社会教育受到了各界更多的重视,确立了服务抗战的目标使命,建立了种类丰富且各有侧重的社会教育体系。既包括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图书馆、艺术馆等较为固定的教育机构,也有电影、播音、戏剧、绘画等更加灵活的教育方式。此外,众多学校师生

也走出校门,投入到社会教育的救亡运动中。通过面向广大民众的精神动员和宣传教育,有效配合了政府征兵、征粮、劝募等工作,强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前线,也在一定程度提高了大后方国民的基本文化素质和生产劳动能力,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第六章 体现多元一体的大后方民族教育。专题梳理了抗战大后方边疆与少数民族教育的历史基础、政策措施、具体发展情况和重要意义。抗战全面爆发后,出于开发边疆、巩固后方等关乎全局的战略考虑,少数民族教育迎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依靠理顺行政归属、组织考察研究、编译教材读物、提高师生待遇等具体措施,大后方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创建了一套体系完整的国立边疆学校系统,地方教育机构也有明显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改善,极大地改变了战前非常贫瘠的教育状态。大后方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当地的文教水平,促进了经济生产的进步,同时也维护了国家的教育主权,彰显了多元一体的教育战略,增强了西部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国民意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七章 抗战大后方教育家群体。专题介绍了抗战大后方教育家的基本概况,并以雷沛鸿、赵君陶等为个案,从不同角度分别详细说明了他们的主要教育思想、教育活动和历史影响。抗战时期,众多教育家聚集大后方坚持从事教育实践或教育研究,通过提供理论支持和发挥引导示范作用,推动了大后方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如赵君陶在办理儿童保育院的过程中,坚持以爱国主义为主导,注重全面发展,强调因材施教,提倡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将大批失去父母亲人的难童培养成为抗战和建国的优秀人才,还总结出了一套颇有成效的儿童教育理论。这些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不仅在当时有着显著的历史意义,也是中华民族教育思想中的瑰宝,时至今日仍值得参考借鉴。

作者提出,专题研究应当回归当今,探寻如何将抗战教育的历史财富转换为现实动力,激发和调动各方力量,推进重庆教育新的发展,提出了两条主要的对策建议。其一,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教育的中心所在,至今仍留存了大量的相关历史遗迹和文物,亟应对此加以妥善保护和深度开发,使之成为

重庆抗战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有利于宣传重庆的历史贡献和文化底蕴。其二,立足重庆教育的后续发展,应该从抗战教育中吸取成功经验。在战时极其艰难的不利局面下,大后方教育仍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这主要缘于当时各界对教育的充分重视和积极参与。当今重庆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高地,拥有的经济优势和稳定环境与抗战时期不可同日而语,更应保障和增加教育经费,树立和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开发战略。同时在政府的引导下,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兴学、助学、向学的良好风气,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力量。

三、研究思路和难点

本书立足整体,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抗战大后方教育加以条分缕析的梳理,力求全方位、多层次、客观真实地展现出抗战大后方教育的历史全貌。在此基础上,针对以往相关研究的种种不足进行有侧重的重点和创新研究。研究思路中贯穿以下两条主线,一是探讨大后方教育对支持抗战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如为前线抗战及后方建设各项事业直接输送人才、提供智力支持和唤起民众的抗敌热情等;二是分析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对大后方教育发展的深远影响,从调整教育布局、拓展基础教育、重视社会教育、施行教育实验等多角度,就教育政策、教育观念、教育实践等方面为现实提供历史经验。

突破的难点:

首先,在现有的史料中,直接反映抗战大后方社会教育、边疆教育和华侨教育的文献记载相对匮乏且不成系统,大多零星散见于战时各类教育年鉴、档案、期刊、报纸及地方文史资料内,这也是以往相关研究较为薄弱的主要症结所在。要弥补这一缺陷,不仅需要广泛搜集整理文献资料,还需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以田野研究、口述历史等方式补充传统史料的不足。因此,突破研究资料零散庞杂的限制,是本课题需要解决的难点之一。

其次,在研究抗战大后方的非主流教育形态,即社会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等问题时,牵涉因素往往并非局限于教育本身,需要借鉴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突破以往的研究思路和定式,有效地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避免以偏概全,这也是本课题研究的一个难点。

第三,在以往的教育史研究成果中,关注某些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或教育活动者并不鲜见,但从抗战大后方教育入手进行群体研究的尚显匮乏,对此本课题将列专题进行探析,并将研究对象定位为抗战期间长期驻留于大后方并对大后方教育产生重要实际影响的教育家群体,以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独特性。然而,抗战时期来到或长驻大后方的教育家人数众多,如何甄别也是一个难点问题。

四、研究可能的创新

第一,研究体系的拓展。在抗战大后方教育的研究领域,早期的相关研究成果多从笼统的角度着眼分析,深层次的挖掘和梳理较为匮乏。近年来,抗战教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但关注重心多集中于正规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涉及战时大后方基础教育、社会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问题者不仅数量较少,且多限于宏观层面。而在地方教育史的相关研究中,某些成果虽对抗战大后方教育有所体现,但大多数是从局部地区的角度进行历史的梳理,未能从整体角度反映出战时大后方教育的全貌。基于已有研究的上述缺陷,本研究在研究体系上做出了必要的拓展,研究结构基本涵盖了抗战大后方教育的各个方面。总共包括七个专题,首先分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教育形成的历史背景,然后对大后方抗战教育政策、大后方基础教育、大后方职业教育、大后方高等教育、大后方边疆与少数民族教育、大后方教育家群体、大后方教育的历史意蕴等分别进行了具体深入的研究,最后立足当前的时代背景,探寻了抗战大后方教育对于当今重庆教育的借鉴价值与启示意

义。通过这些既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的专题式研究,系统地梳理了抗战大后方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状况,也兼顾到了大后方教育的政策方针、重要教育人物及其教育思想和活动,从而构建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研究体系,填补了已有相关研究的空白或薄弱之处。尤其是对于大后方教育家群体的系统研究,是本研究在内容体系上的最大创新之处。教育史的既往研究中关注某些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或教育活动者并不鲜见,但从抗战大后方教育入手进行群体研究的则非常匮乏。本课题将此列入专题,不仅归纳了战时大后方教育家群体的概况,也选取雷沛鸿、赵君陶等教育家为个案,分别探析了他们在民众教育、儿童教育等方面的思想理论、实践活动以及对大后方教育的重要影响。

第二,研究资料的丰富。虽然涉及抗战大后方教育的史料并不鲜见,但直接反映社会教育、边疆教育、教育家思想和实践的文献记载相对匮乏且不成系统,大多零星散见于战时各类教育年鉴、档案、期刊、报纸及地方文史资料内,这也是以往相关研究较为薄弱的主要症结所在。为突破资料零散庞杂的限制,本项目组的研究成员进行了大量的搜集和筛选工作,尽最大程度地丰富了研究的资料。研究资料除西南大学教育学院老一辈学者、课题组负责人及研究成员的已有研究成果外,还包括西南、西北各地大量的地方志、教育志、文史资料集,教育家文选、文集等,总计有数百册之多。另外,课题组负责人2009年5月访问台湾期间,专程向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单位收集了许多的珍贵历史资料与文献,并分发课题组成员。通过以上途径,既充分利用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也补充增加了大量相关的一手资料,为课题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资料条件。

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多局限于传统的教育史研究角度,偏重用历史文献的研究方法来探讨抗战大后方教育问题。本书在研究方法上试图实现两个维度的创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一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因为在研究抗战大后方的非主流教育形态,即社会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等问题时,牵涉因素往往并非局限于教育和历史本身,还需要借鉴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必须突破以往的研究思